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 蔡之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这对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方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理解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内涵及实施重点，对确保宏观调控效果、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

逆周期与跨周期是两种典型的宏观调控模式。从具体思路看，逆周期针对的是影响经济趋势的短期负面因素，是指通过及时采取逆向举措来对冲和消除负面影响进而实现稳定经济目标的调控模式。相比之下，跨周期调控则立足于系统思维，针对的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难题，强调宏观调控应始终围绕影响周期的长期因素来持续发力。二者各有所长、互为支撑，不断提高协调运用二者破解周期难题的能力，有助于加快完善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方面，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应对现实经济难题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和区域分工程度的逐步提高，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元化，而这些因素的持续变化及相互影响，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多层次冲击，也将使得现实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想要同时破解不同发展难题和有效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就必须要求宏观调控体系同时具备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能力。

另一方面，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提高宏观调控能力的必然要求。宏观调控能力是确保宏观调控效果的关键因素。在影响宏观调控能力的诸多因素中，不同调控机制的协调度是重中之重。作为两种主要的调控机制类型，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

要组成部分，二者既存在明显差异，也具有密切联系，且在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大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变量。可见，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既要提高单独进行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能力，更要增强协调进行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能力。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难点在于识别周期

从本质上看，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都是周期调控，准确识别周期显然是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前提条件和必然支撑。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准确识别周期并非易事。

首先，周期在时间上具有叠加性。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周期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并非以“一个接着一个”而是以“一个套着一个”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在一个长周期的运行过程中，往往还会同时包含多个中短周期。换言之，当试图去识别一个长周期是否已经发生时，影响该周期的力量不仅包括自身的长周期因素，还会同时包括多个其他不同中短周期的叠加冲击，这无疑会增加精准识别周期的难度。

其次，周期在内容上具有复合性。从周期所涉及的领域看，经济周期是包含多个领域的综合过程。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往往包含多个不同领域的子周期，这些不同领域的子周期无疑会受到总周期的影响。但不同领域的子周期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与总周期的变化并不始终保持一致甚至还会出现相反趋势。如科技周期、人口周期、消费周期、区域周期等都会呈现特定的运行规律，其变化频率和驱动因素既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差异，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这同样对准确识别周期提出了严峻考验。

最后，周期在指标上具有隐蔽性。各类经济指标及其变化所蕴含

的信息，是我们判断和识别周期的主要依据。一方面，不同部门提供的经济指标往往只能反映本领域的发展情况，在信息含量上具有片面性和单一性，准确识别经济周期必然需要综合使用大量不同部门的经济指标。另一方面，不同部门经济指标的变化并非受同一因素的影响，更不会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态势，在运行轨迹上具有差异性和分离性。如在投资和出口指标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指标的增速却有可能进入下降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精准识别周期同样面临不少困难。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方向和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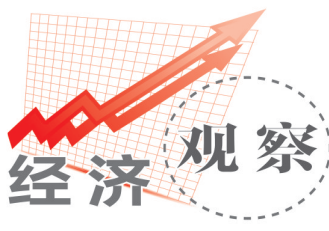
从周期调节的过程属性看，通过提高精准识别周期的能力从而助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应从明确区分调控目标、及时识别周期变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方面协同发力。

以明确区分调控目标为根本前提。宏观调控面临多种不同类型的目标，想要确保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够协调推进，关键是要以正确的调控目标进行统领。一方面，加快优化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长期发展目标，明确区分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总体目标和局部目标，始终将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这是精准识别周期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要引导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按照长期和总体目标进行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平衡好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实现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无缝衔接，从而确保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以及时识别周期变化为根本抓手。叠加性、复合性和隐蔽性是导致周期识别难的主要成因，

破解这一难题，应着力增强宏观决策体系对经济发展变化的识别和反应能力。首先，强化对经济运行尤其是重要经济指标的系统监测，重视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综合运用，引导和鼓励统计部门、相关高等院校探索设计出信息量更加丰富的指标体系，提高对经济运行趋势变化的感知敏锐度。其次，优化宏观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针对不同类型、幅度的经济运行变化，制定相应的决策机制和政策体系，明确不同宏观部门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宏观调控体系对经济运行变化的反应速度。最后，全面梳理和系统整理国内外历次经济周期演变过程，按阶段、地区、领域等不同角度，加快建立经济周期数据库，为更加精准和及时识别经济周期提供更为系统和有价值的工具。

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根本保障。立足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共同目标，在精准识别周期变化的前提下，加快建立政策取向一致性的约束机制。在政策的决策阶段，要强化不同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预判不同政策的现实作用轨迹和相互作用效果，确保政策起点一致。在政策实施阶段，要立足发展实际，针对发展需求，在政策出台时机、政策实施力度、政策持续时间等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的行为一致，避免出现“合成谬误”。在政策评估阶段，要加强对调控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对明显存在相互冲突的政策举措，应建立有效的中止机制；对效果不好的政策举措，应建立动态反馈机制，确保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合力与总体目标始终保持效果一致。



化建设事业的始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少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探索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治国理政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统筹二者关系既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重要着力点。

坚持系统观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

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始终根植于所处的国情世情。发展和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有之不觉，失之难存，一旦安全出现问题将对国家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对于大国更是如此。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提高安全能力的根本途径，一个国家保障安全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发展实力。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只有在发展中求安全，才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保障安全的事业中，也才能有足够的资源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从统筹二者关系的角度，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坚持系统观念，善于抓主要矛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不论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还是把握大国博弈主动权，从根本上都要靠发展。因此，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矛盾问题，应对风险挑战。同时，也要强化底线思维，加强安全形势分析和动态评估，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具体到2024年经济工作，就是要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中求进，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这是当前关于发展的最紧迫任务。同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和条件，强化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数据等领域安全保障，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这是当前关于经济安全的重要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推进经济回升向好

把握和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还要勇敢承担起抓发展与促安全的双重职责。抓发展与促安全都是职责所系，不能顾此失彼、片面强调一个方面的职责。抓发展不能忘了安全；促安全不是不要发展，更不能搞“躺平”“不作为”。尤其在当前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下，要更多为发展想办法。针对影响当前经济走势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同时统筹做好政策的“加减法”，打好政策“组合拳”。在政策“加法”上，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在政策“减”法上，要不折不扣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围绕优惠政策享受、便捷办税缴费、税收执法监管等综合施策，让经营主体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要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在用地、用能、用工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通过优化现代物流治理体系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重点打造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相适应的现代物流体系。

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重担，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经济大省的经济体量大、吸纳就业人数多，新发展动能更为强劲，要以自身经济的“稳”和“进”，稳定和提振预期、加快促进供需循环，为全国经济的“稳”和“进”提供关键支撑。其他省份也要迎头赶上，综合发挥好禀赋优势和后发优势，深刻理解和把握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战略性机遇，稳扎稳打推进经济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动不同区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力格局，还要进一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切实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的关键作用。

把握和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 黄卫捷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安全保障和防范化解潜在风险

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强化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数据等领域的安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压实粮食安全保障责任，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和战略应急物资储备安全保障体系。能源资源安全方面，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强煤炭、煤电的调峰和兜底保障作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聚焦紧缺战略性新兴产业，瞄准资源潜力大的地区，实施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大型资源基地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健全产业跨地区转移相关机制，提升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数据安全方面，按照数据要素特点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不断统筹优化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安全的顶层设计，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安全水平。

着力防范化解各类潜在经济金融风险，稳慎处理好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方面，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部署，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重点稳慎处理好新兴产业和新兴领域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以支持和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立足经济全局和国际竞争，厘清边界，避免简单套用老办法来发展经济，以科学的态度稳妥处置，营造和维护健康有序的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上接1版头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反复强调，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各地方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政策，只能够在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前提下，加以具体化，决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因地制宜’，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执行。”他特别强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

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刘少奇提出，要使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为此，必须要求党员干部进行艰苦的学习，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他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强调“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能够做共产党员的，而必须是他们中间最先进、最有决心的分子，才能做共产党员”。他认为，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都要不断提高党员的标准和条件，培养一支先进、纯洁的党员队伍，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并贯穿现代

化建设事业的始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少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探索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上接1版三条）理想的治理模式是道德高尚的人得到重用，守廉洁的人被任用，而奸佞、奉承的人被遏止，贪利之人被辞退。“廉”是官员选拔与任用的重要标准。君主“无贪利之心”，然后实施一系列隆礼重法、尚贤使能等社会治理政策，公平、正义明于天下，廉洁之人就会涌现出来。

在荀子看来，实现廉政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实现“志意修”。《荀子·修身》中讲：“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正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志向美好就能傲视富贵，注重内在修养就会看轻外物，古书上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对贪利之人提出了

“治气养心”的方法，那就是用高尚的志向引导他们。《荀子·儒效》中讲，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拥有了地位和权力，而天下人却不说他贪心，这是因为周公志向远大。廉洁意识的养成，离不开“尚志”，君子志存高远，是为了推崇仁爱，为政者树立了“隆仁”的志向，就会淡泊名利，真正做到“若保赤子”“视民如伤”。

二是重民本。以民为本是“高志”之一，《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当政者发布政令、制定政策都是为了民众，爱民利民是君主的职责，“无不爱也，无不敬也”。《荀子·宥坐》

认为，如果当政者没有合理的政策，就不能施加刑罚，因为这是政府的问题，罪过不在民众。荀子引用《诗经》“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表达了对为政者的要求以及对民众的爱护之意。

三是实践“义克利”。在荀子看来，好利恶害，君子和小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追求的方式不同。义与利是人们都需要的，即使尧、舜也不能消掉民众对利己的喜好，但是尧、舜可以使民众对利益的喜好不超过对道义的追求。对一个社会来说，道义胜过利益就是安定的社会，对从政者来说，“义克利”能够使官

员清廉、政治清明。《荀子·大略》认为，“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即为政者不看重多少、得失，羞于追求私利，乐于施舍而耻于积累财物，使廉政理念得以实施，才是儒家追求的“治世”，而不是“利克义”的乱世。

《荀子》中的廉洁文化内涵丰富、逻辑严谨，他的廉政理念既具备了儒家“中道”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儒家智慧，又有积极的实践价值，包含修身立志、以民为本、义利关系等一系列内容，是值得深思的廉政文化资源。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